

NIFD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Finance & Development

中国顺应经济新常态， 迈向中高端研究

张平 楠玉 袁富华 等著

Zhongguo Shunying Jingji Xinchangtai

Maixiang Zhonggaoduan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NIFD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Finance & Development

中国顺应经济新常态， 迈向中高端研究

张平 楠玉 袁富华 等著

Zhongguo Shunying Jingji Xinchangtai

Maixiang Zhonggaoduan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顺应经济新常态, 迈向中高端研究/张平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5203 - 1337 - 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594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60 千字
定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摘 要

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达到4035美元，成功地跨过了世界银行关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3975美元）的门槛，跻身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发展，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本书借助两大体系进行分析，一大体系是一国经济如何通过持续的结构性变革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贡献率来迈向中高端发展；另一大体系是结合国际经验数据，讨论中国未来进入中高速阶段，特别是通过区域追赶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和推断。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1）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路径中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过程较为频繁，虽然2015年再次出现增长减缓拐点，结构性减速特征明显，但是，中国经济依然较为稳定，预计2016—2017年，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6.5%以上的水平、“十三五”规划期间，保持在6.5%左右的增长是可预期的。

（2）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需要持续的效率提升仍是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迈入中高端发展的关键是“两个效率提升”。第一个效率提升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提升速度，没有劳动生产率

的提升，就难以进行人力资本深化。第二个效率提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断提高。只有全要素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时，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

(3) 国际增长经验表明，在以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为主导的中等收入阶段，实现迈向中高端发展即要实现发达经济体的高效率增长模式，形成“高劳动生产率、高资本深化能力和高消费能力”的稳定效率三角。而对比发达国家高效率模式和拉美国家低效率模式，研究表明，后发国家长期增长和追赶路径是非连续的，即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型存在跨越门槛。

因此，中国经济要实现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发展，宏观稳定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战略指标和任务，而其最终目标都是要持续提升中国的经济效率。在中国当前杠杆率高、汇率波动大和经济效率低的三大挑战下，宏观政策更要注重守住底线，而不是以继续加大杠杆、降低效率的方式进行，同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松管制，给创新更多的空间，激活微观主体，才能完成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型。

关键词 中高速增长；效率提升；中高端发展；改革

目 录

一	总论	1
	(一) 迈向中高端发展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	2
	(二) 经济结构服务化中的不确定性和 效率模式重塑	8
	(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效率	12
二	文献综述	16
	(一) 从要素配置效率角度	16
	(二) 从技术模仿与自主创新角度	21
	(三) 以改革来实现中高速增长	24
三	中国经济增长加速与减缓	27
	(一) 增长加速与减缓的界定	27
	(二) 增长减缓与经济周期波动	30
	(三) 中国各省份的增长变动情况	32
	(四) 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区域转移情况	36
四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阶段性特征	40
	(一)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40

2 | 中国顺应经济新常态，迈向中高端研究

(二)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	47
(三) 国际增长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50
五 中国经济增长追赶情况	60
(一) 跨国追赶经验事实	60
(二) 跨国追赶系数测算	62
(三) 中国省域经济追赶情况	65
六 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	70
(一) 数据及方法说明	70
(二) 估算结果说明	71
参考文献	73
后 记	77

一 总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经济增长逐步告别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15 年经济增长低于 7%，为 6.9%，2016 年预计增长为 6.7%，2017 年保持在 6.5% 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保持在 6%—7% 的增长区间，呈现中高速增长态势，并正逐步迈向中高端发展。

中国经济迈入中高端发展的关键就是两个效率提升。

第一个效率提升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提升速度，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难以进行人力资本深化。因此，劳动生产率增长决定了一国的福利水平提高与人力资本深化的能力。

第二个效率提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对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综合反映的指标，只有全要素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被视为内生增长比重的测量。放到一个国家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重提高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逐步摆脱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进入到内生增长的道路，而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身，才能克服资本深化带来的资本报酬递

减问题。中国经济当前的两个效率提升都难以达到预期，甚至出现了下滑趋势，挑战依然严重。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在保持经济平稳的基础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效率提升模式的重塑，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端发展。

（一）迈向中高端发展需要 持续的效率改进

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即劳动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重的提升。在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基本上同步伴随着效率改善，但经济结构服务化后，这两个伴随出现了非同步，甚至增长与效率改善无关的现象。

从索洛的增长范式看，只有 TFP 增长，才能拓展增长的可能性边界，而劳动和资本投入要素是规模收益递减的，最终达到均衡，没有 TFP 的持续增长和贡献，经济保持稳态，劳动和资本的深化都会遇到困难。

当前，国内外有关中高速增长的研究包括以下三大领域：

其一，增长转折与“均值回归”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 et al.，2011）关于增长加速（growth acceleration）和增长减缓（growth slow-down）的阶段界定等做了一套统计分析，即在原有增速超过 3.5% 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七年前后平均增速相差两个百分点被称为减速阶段，认为其赶超结束。另一类研究是从赶超国与前沿国家劳动生产率差距与收敛时间计算收敛的情况。即从赶

超国与前沿国家劳动效率的差距收敛速度看后发国家向均衡路径的收敛时间。普里切特、萨默斯专门研究了“亚洲欣快症和回归均值”，以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作为“机械”，即忽略大国特性，按一般国际统计规律进行比较，得出了纯粹收敛时间。按大国间“互动”准则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了世界大国互动下的收敛时间，为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的分析方法。这些研究包括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实证分析体系的。

其二，基于生产函数上展开。第一个讨论的焦点是技术进步贡献，这来自对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质疑，就是TFP在高增长中贡献不足。国际上讨论很多，认为减速的原因中85%归结为技术进步贡献下降（艾肯伯格，2013）。中国也经常讨论“干中学”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问题。第二个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很低，应该实施大规模投资，但资本收益率过低，资本深化难以进行。第三个讨论的焦点是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低，应该大规模实施教育投入计划，但大学生毕业就业难、收入低，配置扭曲，人力资本深化也是难题。这三个问题对应了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三项，即技术进步（TFP）、投入的资本（K）和劳动力（L）。尽管有学者不断提出相同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2008年以来，资本投入增长速度下降，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技术进步贡献下降。

其三，要素配置对增长影响的“缺口”模型（Anton Chermukhin et al.，2015）。一组理论模型和现实数据计算了“缺口”，分解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率，并且还进行了事实分析，文章假定改革开放以后如果中国还保持改革以前的各项经济缺口，以这样得到的经济增长率与

真实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 GDP 增长率提高了 4.2 个百分点（蔡昉，2013；陆旸、蔡昉；2016）；也构建了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缺口模型。

中国经济减速后，当前仍然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但是，高速增长与效率背离问题是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加以讨论。

1. TFP 增长与资本深化

通过用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中国 TFP 计算，得出的结论是：1985—2007 年，中国高峰增长期间，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29%（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细算 1993—2007 年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 35%（陆明涛等，2015），但到了 2008—2015 年，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同时，各种计算表明，TFP 贡献降低到了 21% 以下，用前沿生产函数法计算甚至出现了负贡献，同期主要是靠大规模刺激资本积累的方式来进行的。

1985—2007 年经济增长超过 10%，资本增长速度为 11.13%，而 2008—2015 年经济增长 8.5%，而且逐年下降，资本增长速度却高达 11.7%。同期，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从 1985—2007 年的 1.5% 下降到 2008 年的 0.36%，同期资本回报率也大幅度下降，资本深化无法持续。

资本深化一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是数倍于后发国家的。资本深化是指人均资本存量不断上升，但是，资本存量提高必然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大量资本不愿意投资，出现了资本外流，寻找新的投资收益区域，而国内如果不计成本地靠国家动员来增加资本投

入，将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下降，对民间资本会产生更大的挤出效应，而政府的负值将持续提高，可持续性是严重挑战。

从生产函数可以推出，在满足哈罗德中性条件下，生产函数为：

$$Y = K^{\alpha}(AL)^{1-\alpha}$$

其中， Y 为产出， A 为技术进步， K 为资本， L 为劳动力， α 为资本产出弹性。

推导出资本边际产出弹性公式为：

$$\frac{\dot{MPK}}{MPK} = (1 - \alpha) \left[\frac{\dot{A}}{A} + \frac{\dot{L}}{L} - \frac{\dot{K}}{K} \right]$$

$$\text{或 } \Delta MPK = (1 - \alpha) [\Delta A + \Delta L - \Delta K]$$

即资本边际报酬的变化 = 技术进步变化 + 劳动力变化 - 资本积累变化（同时受到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

由此可见，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回报率随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则越低。发达国家，一方面是靠技术进步推动国内资本深化，另一方面是通过资本输出获得高资本回报进行积累。

近年来，中国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民间投资下降，主要靠政府在基建和居民在房地产上投资来支撑，房地产租金回报率一直低于融资成本，主要靠房价上涨预期来弥补；而政府基建投资主要是按外部性投资的，商业价值越来越低了，长期回报堪忧，而大量的投资维持资产价格高位，资本回报率下降，资金外流成为理性选择，这很不利于中国维持高资本积累。可以看出，没有经济的内生增长，短期宏观的激励维持都受到挑战。

2. 劳动生产率与结构变动

一国经济健康更为简单清晰的事实，就是劳动生产率必须持续提高，增长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从而提升一国福利水平。对于后发国家，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变革高度相关。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十倍于农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因此，工业部门比重不断提高，全国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如果工业效率提升与教育回报率同步，人力资本也会同步深化。但是，经济结构服务化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不是必然了，因为如果服务业的效率持续低于第二产业，则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就会出现严重的效率下降；如果第二产业中过分发展建筑业，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更低，则建筑业比重上升越快，则第二产业效率越低。因此，经济结构服务化并不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

我们计算中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

第一，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994年就超过了第二产业，2015年占全部就业的42.4%。

第二，服务业增加值在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超过50%，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的速度大幅度提高。

第三，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也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由1995年不到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70%提升到了2015年85%的水平。近年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但值得注意的是，依然难以赶上第二产业，特别是与制造业的效率相比，差距仍在扩大。2014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只有

工业劳动生产率效率的 69%。因此，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会直接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

第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2012 年之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达到两位数，但之后降低到了个位数，比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慢得多。

我们再基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内部比重变化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中国第二产业中工业部门不断下降，建筑业部门不断上升，2015 年，建筑业占比已经从 21 世纪前的 10% 左右提升到 16%，而且就业人数 2016 年和工业就业人数基本持平，成为中国最大的就业蓄水池。

第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与工业相比，2014 年相差 4.5 倍。

第三，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几乎是停滞的，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2015 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 2003 年提升了 3.6 倍，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引擎。

对比 2015 年和 2016 年的数据，我们发现，2015 年，服务业快速发展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主要来自金融业占比提升的贡献。金融业占比按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经非常高了，高于发达经济体，因此，再提升金融业占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比较困难。而近年来的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低是来自房地产和基建托底的稳定经济的政策激励所致，建筑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对于稳定就业人数增加非常有效，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而且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拉低了社会就业人数的人力资本需求，不利于人力资本深化。

随着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进一步拓展，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降，而服务业效率提升速度降低。如 2016 年服务业增长

最主要的贡献者是房地产，服务业劳动效率提高会进一步放慢，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都要下降。2016年前9个月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过慢，已经低于GDP增长，实际上已经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乏力的反映。因此，提升服务业劳动效率和进一步提升工业效率，才能有效地遏制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提升我国的整体福利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深化。

（二）经济结构服务化中的不确定性和效率模式重塑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制度机制匹配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的根本所在。因为工业化赶超的效率路径、发展机制和结构转型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似乎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机制来推动转型升级，未能明确新的效率路径，经济增长的跨越是很难完成的，或者需要经过很漫长的探索才能实现。

工业化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很多政策的总结，各国也做了很多实践，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干预。在后发国家市场体系尚未建立时，政府可以作为市场参与的超级主体以弥补市场的不完善性，提出了以下思路：

第一，工业化“补贴”。利用产业政策、选择性金融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鼓励制造业发展。

第二，资本积累激励。国内通过利率管制等各类方法筹集资金，压低国内劳动报酬，提升资本报酬，从而进行招商引资，并展开区域性竞争，达到国内国外筹集资金用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第三，开放政策，扩大市场规模，汇率政策上通过贬值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等。

第四，通过引进设备，完成技术进步的“干中学”，推动国内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五，将 GDP 作为广泛的激励相容性指标，推动地方 GDP 的竞争。

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工业化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经济效率同步提升，经济结构具有加速增长和提升效率的双重作用，并足以弥补干预带来的成本。

经济结构进入服务化后，隐含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增长、结构与效率同步现象出现了重大的不一致性，而国际经验表明，经济结构服务化后，国家增长路径会出现严重的分化，需要认真理解，才能清晰地得出效率路径转换的不确定性和转换的可行路径。从结构与效率的经验事实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结构与效率路径不同步

研究发现，当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快，但其效率低于工业部门，因此，服务业比重越高，就越有可能出现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特征。这一过程不同于工业化，服务化推动的增长不是一个“规模收益与效率递增”的同步过程，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效率低于工业化，因此，各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越高，增长普遍减速，但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却出现了分化，发达国家靠服务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和稳定性，而后发国家的效率改进下降，经济结构更为扭曲，易受外部冲击。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是：

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效率路径非连续，出现了分化。

2. 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成本病”

经济结构服务化普遍导致所谓的“鲍莫尔病”，或称为“成本病”，即由于服务业效率低，但服务需求旺盛，相对价格上涨，导致服务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价格上升，即低效率改进导致的价格上涨，形成了服务成本上升。从广义上看，这种成本病表现为“城市化成本病”，即城市化高成本推进，但城市化过程没有提升聚集和创新效率，因而导致社会普遍成本提高。城市成本问题不仅威胁制造业，也同样威胁服务业的升级。

3. 产业升级不确定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国际比较看，城市化率突破50%后，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即靠低成本的产业要被城市化后带来的高成本所替代，但也包含城市聚集和创新外溢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机遇，成本与效率赛跑。中国城市化成本增长过快，效率改进下降，这是中国已经出现的经验事实（课题组，2009），高成本的住房、公共服务等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有快速“去工业化”的趋势，使服务业从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效率提升的台阶逐步失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失去了战略支点，产业升级变得不确定。

4. “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不确定

“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往往是同质性的技术进步。首先，它受到本地与国际技术水平差距的限制，越接近前沿国家的